

# “教育使节”容闳和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的派遣

胡代聪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容闳是近代学西方的先驱之一,也是晚清最早派出的驻美副使。他的生平活动同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有联系。本文着重介绍他为派遣留学生和主要作为从事教育文化交流的外交人员所作出的努力。

**关键词:** 容闳;中外文化交流;晚清首批留学生的派遣和召回

**中图分类号:** K825.46=5;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386(2001)03-0079-09

## 一、“西学东渐”和留学问题的提上日程

教育与文化的交流,在政府外交和民间国际往来中均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如在唐代,曾经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一些邻国的友人也曾到中国来留学。日本就派遣了多批留学生和留学僧来中国学习,学成回国后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为明显的例证。直到明朝时期,一些亚洲国家还向中国派出留学人员。当欧洲正扬起资本主义的风帆向前疾驶的时候,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却陷入涸流,停滞不前,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落后越来越突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就公然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来宰割和奴役中国。中国一些头脑比较敏锐的人,在长期封闭造成对世界蒙昧无知的情况下,开始对西方为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打败历来自视为“天朝”的中国进行探索和反思。这种探索和反思虽然只不过是起步,但它反映了形势发展引发的观念更新。渐渐有更多的人承认西方国家比起封建的中国来确有其先进之处。要救亡图存或自强求富,就不能回避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其后,连清朝统治者都不得不承认为了维护其统治,必须吸收西方国家的部分长处,才作出派遣成批留学生去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教育的决策。

由政府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设想,早在容闳之前已有人提出过。1863年,有一个拣选知县桂文灿所上条陈中提到他听说日本派遣幼童到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军器之法,

收稿日期:2001-02

作者简介:胡代聪(1928—),男,四川成都人,外交学院教授。

认为“我国家亦宜行之”。<sup>①</sup> 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表示同意说:购买外国舰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但他又说:“唯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sup>②</sup>,实际上把它搁置下来。过了两年,即1865年,薛福成曾向曾国藩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sup>③</sup> 这个建议进一步提出要派青年学生出国学习的问题,而且不仅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还要学其语言学问。但也没有得到响应,更谈不上如何规划实施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派遣留学生的内外条件才逐步成熟。

## 二、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在近代首批由政府派出留学生之前,并不是没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容闳本人就是1847年赴美留学的。而在容闳之前,早在18世纪中叶已有赴意大利和法国留学的中国人。那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那段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西去的留学生也是在来华传教士携带下出国的。无论他们是留在外国或回到中国,都主要是从事传教活动,很少引进西方新知,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容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赴美留学的,虽然仍通过传教士这个渠道。但以后的发展就大不相同了。

在这里,我们先简述一下容闳的生平。他原名光照,字纯甫,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28年清道光时期,卒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他一生80多年的经历是丰富的,也是复杂曲折的。他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先驱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晚清最早派出的外交使节之一。他的活动同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有联系。他曾经用英文写成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被译为中文出版。大概因为要强调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译本取名为《西学东渐记》,流传甚广。近年又出版了名为《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的新译本。如上所说,容闳生活的年代很长,活动和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他立志为派遣留学生计划而奋斗和作为晚清派出主要从事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外交官员这一段经历,其他方面仅述其概略。

容闳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他能够上学是由于偶然的机。1835年时一个同乡邻居的介绍使7岁的容闳进入传教士郭施拉妻子办的不收学费、还供食宿的澳门小学。1841年又入澳门马里逊学堂。次年,马里逊学堂迁至香港,容闳也随到香港就读。他得到后来一直给予他不少帮助的老师美国传教士勃朗的友善照顾。当勃朗及其家人离港回美时,表示希望能带几个学生同他们一起到美国去继续学习。容闳和黄胜、王宽表示了赴美的意愿。1847年4月,勃朗和容闳等一行到达美国。容闳等三个中国学生一同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第二年黄胜即因病回国。容闳和王宽在蒙森学校毕业。王宽转去苏格兰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则决意留美。他的志愿是入耶鲁大学深造,但是面临如何得到经济资助来完成学业的问题。蒙森学校的基金会同意给予奖学金,不过附有条件,即他必须签订誓约,保证将来从事传教工作。这样,容闳就面对决定自己前途的选择,他如同意的话,就会走前面提到过的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到西方学习的人走过的老路。如不同意,他在美国上大学的梦想就可能实现不了。在

<sup>①②</sup>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15。

<sup>③</sup> 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3。

这个关键时刻，容闳心中燃烧着的爱国热情使他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向蒙森学校基金会表示他不能签字，因为这会妨碍和限制他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他“需要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他说：“我虽然贫困，但是决不能受贫困驱使，以我内心坚定的责任感作代价，去换取眼前的利益”。<sup>①</sup>表明这个热血青年已决心不论多么艰辛，他的前途都要同遥远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幸运的是他并未因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用的困难被挡在耶鲁大学的门外。也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勃朗老师和一些真心帮助他的外国友人设法为他解决了这些困难。他终于参加了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并被录取，开始了以后几年半工半读、刻苦努力完成大学学业的行程。1854年夏，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 三、毅然回国和奔走探索

容闳后来所致力之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在他还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特别是毕业前一年已经基本形成。他曾这样表述当时的心情和决定：“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sup>②</sup>通过认真的思考，他得出了答案：“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代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sup>③</sup>

为此，在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可以在美国谋求职业并过上优裕生活的前景，决心及早回到祖国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他说：“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sup>④</sup>

容闳回国以后为了维持生计，曾经在广州、香港、上海谋职，后来又自己经商。但他始终在寻找能够推行他的教育计划的机遇。因为他始终深信，这是“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sup>⑤</sup>为此，他曾经到太平天国去寻求这种机遇。容闳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太平天国革命还没有兴起。而当他学成归国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烈焰，形成了与清廷对峙的政权。容闳对太平天国并无多少了解，回国后却因在广州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民众的残暴镇压而产生了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当时他听说1855年夏天“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头，半数以上的人的罪状并非叛乱，只是因为被敲诈未遂而遭殃”。<sup>⑥</sup>他曾亲到刑场，看到血流遍地、尸如山积的惨状，激起极大的愤慨，他“当时想，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分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可是冷静地思索之后，还是退回到原有计划。”<sup>⑦</sup>1859年秋，有两个西方传教士要去南京访问太平天国，容闳决定趁此机会同往，“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sup>⑧</sup>1860年11月他们从上海出发，经苏州、丹阳、无锡、常州到达南京。在容闳的自述中，客观地记述了沿途所见太平军纪律严明的实况：“我们在大路上所遇到的叛军，总的来说是很有礼貌的，并且尽量设法保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序言及各章。

护人民,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凡烧杀掳掠及虐待百姓等行为,都处以死刑。”<sup>①</sup>到南京后第二天,他就被邀请去会见干王洪仁玕,这时已是太平天国后期,总理天国政务的就是这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是天国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当时天国领导人中最了解世界形势的人。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进行改革而由天国正式颁布的政策文献。容闳在香港时即曾与洪仁玕相识,会见时他向洪仁玕提出了七项建议,其中有四项都涉及教育,如“设立一所军事学校”、“设立一所海军学校”和“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等。并表示“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实行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我深愿贡献力量以促成其事。”<sup>②</sup>洪仁玕同他讨论了这些建议并说他深知这些建议的积极意义,但暂时无法实施。实际上当时太平天国的外部军事环境和内部条件都不可能从长远目标来考虑和推动这些建议的实行。对这个答复以及在天京一个月的考察使容闳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他谢绝了洪仁玕的挽留,退还了送来的“义”爵官印,返回上海继续经商。但并没有放弃探索和等待实现他的教育计划的机会。

1863年,容闳先后接到在上海结识的朋友张斯桂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他们都在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幕中。他们向容闳转达了曾国藩的邀请。容闳起初表示婉拒,后来李善兰等继续转了曾国藩渴欲一见的心情,并说明曾国藩正在筹备建立使用新式机器的工厂,了解到容闳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经历后,希望能利用他的才能和对外国情况的熟悉,协助这方面的工作。推动中国的工业化本来是容闳的愿望,而且觉得这是实现他心中教育计划的一个契机,所以他决定前往。当他同曾国藩会晤并同曾国藩幕中一些当时杰出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讨论后,接受了曾国藩的委任,以出洋委员的名义于1864年再次赴美。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尚未结束,他克服了订货的困难,于1865年安全运回了这批首次从西方引进的成套设备,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基础设备的骨干。他因此受到曾国藩的赞誉,并为他奏报请奖。容闳趁曾国藩于1868年到江南制造局视察时,向他提出为了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应在局下附设机械学校的建议。这一教育方面的建议得到采纳,更使他希望借助洋务派之力来推动由清政府派遣成批留学生的计划。

#### 四、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实现

正在容闳积极为推动派遣留学生计划努力的时候。清廷内部和国际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这个计划的条件。清廷在1862年批准开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在其后也相继诞生。1867年为了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使其向着学外语兼学西学发展,并聘请西人为教习的问题,触发了一场洋务派同守旧派之间的大争论。这场大争论又同清廷上层的政治矛盾互相交错,最后还是适应实际需要的洋务派占了上风。这才有可能减少阻力而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提上日程。

在国际条件方面,1866年《中美续增条约》对留学问题专门做了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表明美国可以接受中国留学生从事文理各科的学习。(这里所说“文艺”与今天常用“文艺”一词涵义不同,艺指技艺)这一规定为美国接纳

<sup>①②</sup>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序言及各章。

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依据。

据容闳自述,1868年在他的老朋友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他首先同丁讨论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丁日昌甚为赞许,并促他写出详细的报告由他转报“相国”文祥,请其代奏。但因文祥居丧而搁浅,不久文又去世,所以没有结果。有些论著已指出关于文祥的记述有误。因文祥当时还不是“相国”,而且他是在留学生派出后才去世的。这可能由于容闳晚年回忆不太确切之故。但容闳首先向丁日昌论证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始终得到丁的助力则是事实。

1870年容闳又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这一计划,曾同意由他和其他大臣联名向清廷奏报。1871年递上奏折后,终于得到“着照所请”的批示。容闳得知他等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十分兴奋,随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1872年初,设立了“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和容闳分任正副委员。在刑部任主事20年的陈兰彬,从未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做好这项工作的准备,只把它当作升迁的阶梯。曾国藩和丁日昌曾表示,推荐陈兰彬是因为陈是“正途出身”的翰林,有他参加这项工作可以避免一些阻力。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洋务派的首脑们对容闳并不放心放手,任用陈兰彬正是为了牵制容闳。李鸿章曾说,如果没有容闳的先导,陈兰彬将“寸步难行”,因只有他熟悉洋情和语言文字,但他“汉文未深,又不甚识大体,亦是一病。”<sup>①</sup>所谓“不识大体”,是指容闳同他们之间存在思想差距。他们要培养的是为封建王朝效力的洋务人才,容闳却要按西方教育方式来塑造学生。这种差距发展为冲突是难免的。

在派遣留学生方针已定后,进一步制定了有关的章程办法。决定在1872-1875年间,每年选派留学幼童一批,名额为30名,四年共派出120名。学习年限为15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还决定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以及如何保证经费等事项。

在当时条件下,愿意送子弟赴美留学的家庭并不多,有地位、有钱的人家把送子弟远去未知的海外异域视为畏途,希望子弟在国内博取功名或安享富贵。愿意送子弟出洋的几乎都是风气比较开通的沿海地区“出身微贱”的子弟。第一批学生初次招收并未足额,其后又补充招收才凑足人数。招生工作结束后,容闳先期赴美,为留学生的入学和安置做准备,并筹备“驻洋肄业局”即留学事务所的开办。这些工作有了眉目后,留学幼童30名由陈兰彬带领于1872年8月从上海乘轮船前往美国。这就是近代中国由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 五、“联外交而窥秘钥”的留学监督和驻美副使

首批留学幼童赴美后,第二、三、四批留学幼童也按照原来计划于其后3年中相继到达美国。他们都是先被安置在美国居民家里,由设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的中国留学生驻洋肄业局进行联系和管理。在生活比较适应,英语有了基础后,分别入初、中级学校,待毕业后再考入高等学校,学习各种专业。

留学生到美后,驻洋肄业局即开始工作。仍由陈兰彬和容闳分任正副监督。工作人员还有中文教员、翻译及办事人员等。但留学生到美后生活学习的各种安排主要都由容闳操办。他努力打开同美国官方和民间的联系渠道,取得他们对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支持。当初曾国藩等向清政府保举容闳率留学生赴美的奏折里曾说 he 练达熟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旧游之

<sup>①</sup>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译署函稿卷18。

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sup>①</sup> 就是说他了解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情况,能够做好外交方面的工作,并通过留学生教育去找到打开西方科技之门的钥匙。的确,容闳这个留学生的监督,在当时中国在美尚无使馆的条件下,实际上起着负责教育文化交流的外交官员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容闳还完成了清政府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情况的外交使命。自19世纪下半叶起,许多华工在被招募做工的名义掩盖下被骗往需要苦力的美洲。据估计自1849-1873年间被运往秘鲁的中国苦力约有10万人。他们被塞进号称“浮动地狱”的海船上运走,到达后也备受虐待,大批华工不死于途中就死于工地。这种情况反映到国内,清政府决定派员调查。1873年容闳被指派前往秘鲁调查华工情况。他在秘鲁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取得了华工受迫害的确实证据。他怀着义愤的心情写了附有华工遭受残酷鞭打等情况照片的报告呈交国内。当李鸿章奉命同秘鲁来使谈判时,用这些材料和照片令对方无法辩解。1874年清政府同秘鲁签订的通商条约中,写入禁止拐骗掠夺华工做苦力和不得虐待华工的条款。

在第四批留学幼童到达美国那一年,清政府开始派遣驻外使节。首先任命的是驻英使节,接着在1875年12月宣布了陈兰彬和容闳为驻美正副使节的任命。这样,容闳就成为近代最早派出的驻外使节之一。(驻美正副使节后来又兼任驻西班牙和秘鲁的使节,当时称驻美、日、秘使节。“日”不是日本而是西班牙,因那时西班牙译为日斯巴尼亚)容闳在接到驻美副使的任命后,曾向国内提出请求,希望收回成命,允许他留任留学生监督直到这些学生学成归国。答复是对他担任副使的任命不作改变,但同意他仍兼任出洋肄业局的副监督职务。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始终把完成留学生的教育计划看作“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他不能离开这项工作。

## 六、成长、矛盾到半途而废

留学幼童到美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学习,取得了显著进步。1876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李圭到费城参观为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见到这些中国青少年留学生。他在回国后撰写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描述了对他们的印象。他说,在费城博览会的教育馆里,陈列了这些中国留学生的作业,受到西人的称赞。随行翻译也告诉他说,看来这些幼童在美“攻书二年,足抵其当日在香港学习五年”。他还称赞这些学生“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同他们谈话后,更觉他们“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这是从国内去的不带偏见的中国人的观感。

至于美国友好人士对这些留学生的看法,则反映在1881年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信里。他们表示:“据我们目睹和所了解的情况而言,这些青年大都勤恳学习,在指定课业方面以及对美国语言、思想、艺术及礼俗方面的知识,都有极大进步。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的举止彬彬有礼,风度文雅,所到之处,无论家庭、学校、城市或乡村,都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祖国建立了友谊。他们无负于他们的家庭和国家所寄予的信任。他们在异国的表现是杰出的。虽然他们还在青少年时期,但是已理解到他们有责任保持他们的民族和国家的荣誉。他们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sup>②</sup>

<sup>①</sup> 《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

<sup>②</sup>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序言及各章。

与这些意见相反,直接领导留学生的首任正监督陈兰彬和以后的一些继任者,却对这些学生怎样也看着不顺眼,同他们经常发生矛盾。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留学幼童年龄和学识的增长,并且受到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逐渐对这些人坚持的封建管束方式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们要求留学生定期到出洋肄业局来学习“中学”和听他们的训示,除了死灌封建教条来束缚学生的身心,还要他们敬听清朝皇帝们的“圣谕广训”,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必须遥望清王朝的官阙叩头行礼。对学生们的服装、行为都有许多禁忌,连参加体育运动和游戏都不允许,剪去发辫更是叛逆的行为。在新环境里成长的这些青少年对一些不合理的约束当然不会衷心遵从,矛盾摩擦也就难以避免。而容闳则“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因而陈兰彬等人同容闳的矛盾也日益明滋暗长。陈兰彬升任驻美正使之后,就不再到哈特福德驻洋肄业局去,但并未停止对留学生事务的干预。容闳作为副公使兼副监督本应发挥更大作用,却受到多方限制。

当最后一任留学生正监督吴嘉善上任后,同留学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他刚一来,就因留学生不行跪拜大礼大发雷霆,竟对学生施以鞭笞。此后一方面不断对学生吹毛求疵;一方面不断向国内打小报告,告留学生如何不守规矩,容闳如何加以纵容。1880年更通过陈兰彬转奏清廷,建议撤消驻洋肄业局和撤回留学生。主管此事的李鸿章曾主张“已入大书院者留美卒業,其余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并提出应征询陈兰彬意见,而对留学生的派遣、教育和管理做了最大努力的容闳却完全被排除在外,根本不让他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陈兰彬则上奏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诗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染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sup>①</sup> 总理衙门最后作出了裁撤决定。美国教育界人士的抗议和美国总统格兰特致书李鸿章劝阻也未发生作用。

1881年中,留美学生除因病和其他原因先期回国以及少数“告长假”者外,共94人分批回国。其中只有詹天佑等二人已自高等学校毕业。当时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对此提出了批评,也是外交官的爱国诗人黄遵宪写下了《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长诗,描述了留美学生凄然归国的情状,并深表惋惜:

“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

“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sup>②</sup>

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不过加四年功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遗训中外。”<sup>③</sup>

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被分送到国内学堂再学习或“学习当差”。因未完成学业,限制了他们作用的发挥。但还是有一些人在发展工业、矿业等方面有所建树;也有的进了政界,做过国务总理、部长之类的高官。而令人至今不忘的是詹天佑这样最早独立设计、勘测、建造了京张铁路的杰出工程人才。当我们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参观詹天佑的纪念馆时,回顾一百多年前同容闳联系在一起这页历史,还会感受到近代首批留学生留下的一抹余晖。

① 《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3。

③ 《郑观应集》,上册。

## 七、造成留学生培养计划半途而废的原因何在？

留美学生的撤回，似乎是陈、吴之流同学生和容闳矛盾积累发展的结果，但必须看到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培养留学生问题上洋务派指导思想本身包含的矛盾。洋务派接受容闳的倡议，作了派遣留学生的努力，但它的指导思想是培养维护当时封建制度的人才。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用在留学生的培养上。他们所说的“中学”，并不是要留学生真正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是要用封建的思想糟粕控制学生，使其不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而离经叛道。陈、吴等人守旧的倾向重一些，但他们也标榜自己是通洋务的。吴嘉善还自称对化学颇有研究。应该说他们执行的基本上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偏离了洋务派指导思想的却是容闳。李鸿章就曾向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学中学”。并令容闳“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即吴嘉善）设法整顿，以一事权”。<sup>①</sup>实际是信任陈、吴而不信任容闳。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因为李鸿章虽是当时比较了解世界形势并提倡西学的，但他所谓借西法自强主要是要学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所以维新派批评他们是“变事”而不是“变法”，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这种立场同陈、吴自然比较合拍，对学生的“越轨”和容闳的“放纵”自然不满，所以站在陈、吴一边，使清廷作出了撤回留学生的决定。可以说，派遣赴美留学生既成于洋务派之手，其半途而废也毁于洋务派之手。

## 八、前进精神和跳动的中国心

留美学生的撤回也是容闳作为“教育使节”生涯的结束，在1881年被召回国。他在外交方面所做最后一次努力是向清政府呈交了一份制止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计划，但未被采纳。1882年他因照顾生病的美国妻子赴美，一住13年。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向国内陈述了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想法，同年回国，先后受聘于张之洞和刘坤一，但都无所作为，时间也很短暂。他还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建立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建议，也都未成。他对清政府更加失望。这期间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参加了维新运动。他的住所成了维新派领导者的聚会之处。戊戌变法失败，容闳也被列入清廷密令逮捕的名单，他化装逃往上海。1900年唐才常筹划发动自立军起义，并于这一年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议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其后自立军起事计划失败，容闳逃亡日本，与孙中山结识，转向同情革命。后到香港，他的朋友兴中会的谢缵泰密谋在广州起义，准备推容闳为临时政府的总统，因事泄失败。1902年容闳回到美国家中，仍同康、梁和孙中山保持联系，但逐渐转向完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容闳感到欢欣鼓舞，他致电孙中山表示热烈祝贺。孙中山也致电容闳说：“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回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sup>②</sup>正当容闳兴奋地准备回国时，宿疾复发，于1912年4月在美国去世，终年84岁。在他弥留之际，还谆谆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一定要回到中国，为他终生眷恋的祖国效力。后来他们都遵从父亲遗愿回国

<sup>①</sup>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译署函稿卷18。

<sup>②</sup> 《孙中山全集》，第3卷。

服务。

容闳一生的经历是曲折复杂的。他在1847年到美国北方求学时,距美国独立战争才半个多世纪,南北战争尚未发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青年容闳更多看到它先进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一面,同落后和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使中国变得民主富强,是可以理解的。“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sup>①</sup>容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人物之一。他花了多年心血经营的留学生的派遣和培养虽然中途夭折,但它开拓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去寻求真理、学习新知的新渠道。当然,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留下那个时代的烙印。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性认识不足,曾幻想借助外力来推动中国改革和认为通过接受西方教育就能救中国。但是,他同以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那种企图把中国变为西方附庸而主张西化的人是有根本区别的。特别在他的晚年,承认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摆脱了对洋务派的依附,毅然参与维新,进而支持革命,并反对“掠夺成性的列强”干涉中国内政。说明了他的认识和行动都在进步。虽然他也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瑕不掩瑜。他的一生中,有两个不可磨灭的闪光点:一个是追求不息、奋斗不止,顺着历史潮流前进的精神;另一个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动力,就是他那始终燃烧着爱国热情的跳动的中国心。

(责任编辑 延风)

## Yung Wing, the Educational Envoy and the First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Sent to U.S.A. in Modern China

Hu Daicong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Yung Wing (Rong Hong) was one of the forerunners in modern times that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was sent to America by the late Qing to serve as the envoy in the initial stage. His lifetime activities had all the links with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known the effort made by YungWing, as a diplomat mainly responsible for cultural exchanges, towards sending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Key words :** Yung Wing ;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 sending students studying in abroad and recalled by Late Qing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